

达沃斯应讨论“全面结算的人民币”

王宸

世界经济论坛已在瑞士达沃斯开幕,会议将讨论全球经济如何尽快复苏并找到新的增长点等举世瞩目的话题,笔者认为,论坛不妨像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充分讨论在中国经济探底回升之后,如何更好地利用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条件;在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议题中,也像储备人民币、“求助于人民币”那样,讨论在世界范围内人民币需求大幅增长、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向全面结算货币转变的趋势,为世界经济全面回暖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求助人民币的债务逻辑

最近有外媒报道称,欧洲有些国家秘密储备人民币,特别是西方国家“求助于人民币”、发行熊猫债券等,进一步指向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环节即自由兑换,似乎在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前,人民币不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因而西方国家发行熊猫债券筹集资金在资本项目下是十分有限的。但事实上,如果世界经济复苏进一步动荡,不能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一些国家以国家信用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资金、回购本国债务这条路迟早会成为现实。

从经济复苏、解决危机的角度出发,高负债国家通过适时回购降低债务水平,实质是财政紧缩的一种辅助措施,甚至并不仅仅是危机国家才会这样,以市场收益率和投资者的意愿作为行动的标准,任何高负债国家一边需要财政紧缩和减支措

施,另一边则需要从国债市场适时回购以降低债务水平,那么资金从哪里来呢?其实资金的来源很简单,像美国这样的3A级国家不断提高债务上限,从市场借更多的钱就可以了;而国债评级被不断降低的国家就不得不举借外债了,当无法举债时就只有请求救助了,希腊被迫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了希腊,欧债危机的其他国家有的请求救助,大多则是大量举借外债,即用新债还旧债直到债务水平大幅降低。

从根本上讲,“求助于人民币”实质是人民币进入国际债务链条的一种方式,在中国没有大规模地全面救助之前,人民币仅仅是各个国家、各种商业金融组织可以用以调节优化债务结构的重要选项,只有世界银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可以选择大规模增加发行人民币债券,用以购买中国的外汇储备并实施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救助,特别是IMF提高中国份额的措施,也筹集了大量的人民币资金。如果世界经济进一步动荡,不能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么,一些国家以国家信用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资金、回购本国债务这条路迟早会成为现实。

人民币国际化面临双重考验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开放,举借人民币购买中国的外汇储备则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由于中国目前一年期基准利率维持在3.00%,与西方国家的低利率有较大的利差,一旦各国央行上调利率,未来利差的

缩小能够获得较大套利空间,所以私人资本向高利率国家流动,高负债国家则可能逆周期地通过举借外债以回购本国债务。不仅如此,外国资本也倾向于在中国发债,以更可靠的筹资方式募集资金,调整自身的债务结构,当然回购债务不是偿还债务,只是优化债务结构的手段,所以“举借人民币购买中国外债”对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而言是商业金融行为,对于主权国家而言则是债务调节的重要选项,实质是人民币用于全面结算、特别是资本项目结算的重要表现之一。

所以,中国和人民币的国际化面临双重考验,一方面中国需要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最终走向完全自由兑换,以后为人民币在国际债务链条中确保有利的地位,最终使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另一方面,中国则需要对“求助于人民币”的各种变通的方式保持警惕和监管,特别是对商业金融组织举借人民币资金,要有适当的监管和评级,并需要相应的债务担保和条件,以避免外资“涌入中国发债”的局面,尽管目前这种局面还看不到,但随着世界经济回暖,一些国家的商业金融组织有更多的担保措施可以在中国增加发行债券的规模,因此,中国适当控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速度,稳妥地推动资本项目的开放,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等诸多举措,是审慎地宏观监管的必然选择。

离岸市场与全面结算

但是,全球讨论人民币国际化关注的是离岸市场、贸易结算与自由兑换、国际储备等关键环节,作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

不仅仅是在贸易结算领域,而应在更广泛的经济金融领域都可以承担结算清算的手段,所以,代表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相应作用的人民币国际化,除了扩大贸易结算的范围和规模之外,更应该扩大作为结算清算的范畴,即应该寻求或推动人民币的全面结算地位。人民币作为世界通用的全面结算货币与完全可自由兑换大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但人民币仅仅自由兑换往往是市场的范畴和行为,而全面结算则与国际储备货币相近,特别是在全球债务链条中的全面结算与清算地位,才是真正发挥人民币的国际功能、“求助于人民币”的实质所在。

所以,达沃斯论坛的世界经济学家和学者们在探讨中国经济与金融对世界经济正溢出效应时,要真正推动人民币发挥国际贡献,必须从当前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大步前进,不仅注重离岸市场的交易计价和市场结算功能,在离岸市场的层面讨论国际储备货币的实际意义并不大;更应该向前看人民币如何实现全面结算功能,如何在债券市场中发挥其他国家和商业金融机构的债务调节功能,这样才能真正讨论人民币的全面结算与完全可兑换、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如此,才能找到人民币国际化对世界经济的积极作用,并更为深化地寻找人民币国际化所带来的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

■算法经济 | Li Bin's Column |

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启示



李斌

经济利益是一个社会的中心利益,而政府的政策对它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我国这样的社会中,政府拥有超级的权力,所以公共政策对于经济利益的影响更为巨大。然而,在一些有益的政策得以出台的同时,经济政策的制定却不时地犯着许多错误。政策争议原本是正常的,但一些政策直接违反基本的经济规则,以致完全可以定义为“错误”。例如,为了“防止房价过快上涨”,所实行的政策实质上是在搞限价保价。在逐步纠正旧体制的弊端和过往政策错误的同时,新的错误却不断发生。这表明制度流程中存在某些系统性的缺陷。这促使我们有必要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政策制定具备应有的科学化 and 专业化水平。这是需要全国人民关注与思考的重大问题。

为此,笔者考察了美国的有关制度安排,觉得受益匪浅。尤其是美国联邦政府中所设立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有时译为“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或“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值得我们予以研究和借鉴。该机构是依法设立的准部级机构,由约20名由总统任命或聘任的专业经济学家组成,辅之以若干助手和办事人员。其中的3名最高级职位需要经过立法机构批准。这些经济学家们一般都来自大学和各个研究单位,在白宫的任期是短暂的和暂时的;任期结束后,一般都仍返回原有工作单位。作为总统的首要经济智囊,“经济顾问委员会”是一个小而有力的机构,它在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中向来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们可以向这一机构借鉴些什么经验呢?首先,应当提高政府智囊机构的行政级别,使之作为常设组织,走向前台,处于公开和显要的位置,成为政策制定流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这种安排的一个好处是,政府领导人可以不采纳顾问的意见,却不能阻止顾问发表意见。这样一来,领导人就会得到适当的信息。

其次,顾问职位采用任期制,既可以保证顾问与政府领导人具有彼此一致的政治倾向,从而真正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又不至于使人员队伍发生僵化。现有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本是作为政府智囊机构而设立的,但是,由于它仍沿用老式的行政体制和用人制度,如今已经几乎变成了一个赋闲养老的单位。然而,领导人总是需要顾问的,如果现成的机构设置不敷需要,领导人只好向其他渠道寻求襄助,其结果是,顾问的来源变得分散和非正式化。公开的顾问制度意味着,领导人选择顾问的范围是受到一定限制的,不能随意选择那种明显缺乏资历、又缺乏社会支持的人员参加做事,决策流程不能黑箱化。这种制度也是对领导人的一种保护。由于经济政策的专门性,各类政策其实主要都是来自各类经济专家的,可是,假如决策流程不够透明,领导人就有可能承担过多的政治责任。政策出了问题,作为国家官员,

提出该政策的顾问首先应当承担责任。他不仅应当向所服务的领导人负责,也要向公众负责。领导人所承担的只是决策上、政治上和用人上的责任。这种区分是“责权利相对等”原则的基本要求。他也是对顾问人士的一种激励,以免他们只能在幕后秘密地做“无名英雄”。

鉴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应考虑借鉴和引进这一制度。这样的顾问委员会可以新设,也可以在改造现有机构(例如国研中心)的基础上成立。经济政策的制定机制固然涉及范围更为广泛的体制改革问题,不过,不妨先从行政体制这个相对最为容易的地方做起。

有人可能会反对这个提议。他们也许会问,目前我国党政机构的领导人普遍拥有越来越亮丽的学历背景,提议设立这样的顾问委员会,难道是对领导人的政策制定能力不够信任?笔者的回答是:非也。政治领导人通过一定的竞争获得相应的职位,这表明他们是精明强干之士,其高学历背景对于理解、吸收专业意见和提高判断力也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然而,这终究是不够的。就好比汽车厂要聘请最好的工程师来设计汽车一样,国家也应该聘请最为杰出、最为胜任的经济学家和经济专家来设计经济政策,而我们不能奢望所当选的政治领导人恰好就是这样的人。政治人物毕竟是政治人物。政治是公共生活的重要领域,政治工作的专门性应当受到尊重;同时,鉴于“术业有专攻”,一般来说,政治人物不可能同时也是经济专家;在分工的社会中,这也是不必要的。这个道理与美国相同。美国国会拥有强大的研究和政策制定能力,可是,国会议员们却认为,为了吸收专家们的意见,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这样的超党派和专业性机构是必要的;其原因就在于,国会本身是政治性的。

领导人同我们大家一样,也是常人。政治领导人并非有三头六臂,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管理是很复杂的,其专业性是很强的。对于这样的重任,连资深经济学家们也往往感到勉为其难,何况对于非专业人士?经济学固然有其自身的问题,本身亟须发展和完善,但这绝不表明,仅仅凭借行政经验和直觉行事,就可以把我们这个复杂的经济体管得更好。没有人是全知全能的,而一个好制度的标准是,能够把实际经验与抽象知识相结合;为此,在实干者聚居的场所,就应当把研究者补充进去。这样的措施一定会使各方都受益。此外,鉴于各类利益集团的活动目前正在越来越显著地影响着经济政策的制定,一个专家型委员会的设立也将有助于平衡和抑制他们的影响力。

有人也许还会担心这将造成机构重叠,而笔者的意见恰恰相反。现在全国各地各部门设有大量从事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的机构,而这些机构恰恰缺乏一个总的协调者。与政策有关的研究要有组织地、有系统地、持续地、递进地进行。政策提议应当首先在专业人士之间进行讨论,然后再提交给领导和公众进行选择。相信这样的举措对于相关研究领域的进步和职业经济学家群体的发展,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如同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一样,各地各部门同样也有必要建立正式的法律顾问制度。每个行政单位的政令和事务,如果都有法律顾问参与其中,就可以避免政府部门执法犯法这样的尴尬事情发生,政府部门的法治观念和守法意识就会大为提高。这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将会是十分有益的。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说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0755-83501640;发邮件至pp118@126.com。

有必要建立欠薪保障基金

闻一言

还有半个月就要到春节了,在外地打工的农民工朋友也要陆续返乡,带着一年的收获和回家的礼物与家人团聚。可是,近日,在吉林长春等地,却仍然有农民工集体讨薪。

又到讨薪高发期。每到年末岁首,欠薪、讨薪问题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不仅让劳动保障和监察部门非常棘手,也让农民工感到十分头疼和困顿。处理这一老大难问题,仅靠劳动保障部门解决显然不现实,靠企业一力解决同样存在难度,靠劳动者奔走讨薪更是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构建社会化解决的长效机制——解决欠薪的社会化机制一般由法律、政府及社会相关主体共同建立。

应当看到,产生欠薪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种是恶意欠薪,有意逃避支付工资的义务;一种是企业经营困难,无力履行支付工资的义务。针对恶意欠薪,国家从法律层面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将恶意欠薪入刑的条款,以提高恶意欠薪的违法成本。而针对企业破产和经营困难所出现的欠薪,则多由政府和社会相关机构垫付的方式解决。一般情况之下都由物业主、所在地政府或市财政支付的惯例。

无法回避的是,无论是欠薪入法提高恶意欠薪的成本,还是由政府和社会相关机构垫付提高偿还欠薪的速度,共同的特点都是事后追讨和偿还。这种事后的追讨和

偿还机制的优点,一方面发生欠薪后,责任人并不缺位;另一方面追讨得到社会机制的保证。可是,结果却是好有坏,效果难有保证。所以,这样事后追讨与偿还的机制,不仅对农民工而言缺少应有制度保障,对地方政府而言,偿还欠薪的压力也非常大。如企业集中破产,欠薪大量发生,就有可能出现压垮地方财政的风险。

众所周知,与恶意欠薪有着明显的区别,就是开办企业难免遭遇经营失败,企业破产是经济活动中不可能杜绝的现象。而这种因企业破产倒闭引发的欠薪现象,需要政府建立欠薪保障基金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许多西方国家,欠薪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从来也没有形成能威胁到社会稳定的恶性事件,也未造成社会性的动荡。其主要的做法就在于,全方位构建解决欠薪问题的社会化管理机制。

构建欠薪的社会化救济体系,其主要方法就是设立欠薪保障基金。欠薪保障基金由企业按工人工资的一定比例交纳,在国外,这个比例大体在0.15%~0.45%之间,同时,国家也会拨付部分财政资金给予补充。这个机制,除了破产清偿的追讨制度外,还配备了社会救济性的转移支付保障体系。一旦发生欠薪,这一机制就会自动启动,不仅节约了农民工的追讨成本,保障所有劳动者都能拿到欠薪,还使政府从欠薪冲突中解脱出来,杜绝了追讨欠薪机制中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风险,确保社会稳定的大局。



去年证券交易印花税收入同比降三成

证券交易印花税,去年收成不太美。股市低迷多亏损,交易惨淡都倒霉。税金好歹征些许,股民只能暗伤心。满盘皆输因熊市,共赢还须迎牛归。

唐志顺/漫画
孙勇/诗

基尼系数告诉我们什么?

胡月晓

近期国家统计局在解答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时,首次公布了中国居民的基尼系数,阐释了多年来一直为外界所关注的中国居民收入分布情况。从公布的基尼系数看,中国收入不均情况比较严重,收入差距较大,但还没有到严重失衡程度,还不至于到收入差距悬殊的地步,且自2009年以来就处逐渐改善过程中。作为新公布的一个重要宏观经济数据,基尼系数不仅揭示了收入分布状况,而且还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未来经济运行格局提供了全新观察角度。

一、基尼系数和经济增长。一般认为,消费增长和收入增长密切相关。综合而言,社会总消费需求大小受消费水平提升和比较效应影响,收入的消费边际递减效应并不明显,更为一般的实际表现是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同步变化。当社会中收

入差距扩大、即基尼系数扩大时,在相同的社会平均收入增长下,富人的占据份额增加,由于富人群体本身消费的超前性,富人群体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递减效应极有可能超过消费水平的提升效应,导致全社会收入增长对总消费需求规模提升的作用下降。另一方面,穷人占据份额下降,意味着穷人收入增长不足,同样也会带来社会总消费需求水平增速的下降。从2003-2012年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增长的变化情况看,两者大部分时间是同步变化的,但2004年和2012年却是例外:2004年收入增速回落,但消费增速继续提升,2012年也是如此。仔细观察发现,例外情况出现这两年都是基尼系数回落的年份。有趣的是,这两年的基尼系数基本接近,2004年为0.473,2012年为0.474。我们有理由相信,0.474是有利于收入增长对中国消费需求提升的基尼系数分界点,可作为改善收入分配的基准。

二、基尼系数和经济周期。基尼系数衡量的是居民收入的均等程度。一般说来,一个社会中收入分布越是不均,收入增长对消费的拉动作用就越乏力,消费需求的持续性就越成问题。经济发展、收入增长、需求上升三者之间的正循环就容易出问题。在投资仍为第一经济增长动力的中国经济发展现阶段,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不足以成为制约增长、决定周期的决定性因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消费率也必定会提升,消费需求在总需求中的比重会上升,消费增长的持续性将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转变增长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

三、基尼系数和税收改革。基尼系数过大,意味着收入差距过大,长期积累的结果必然导致财富社会分布差距过大,社会不安定因素上升。综观当今世界,各国

的收入分配改革、税收体系调整,无不与改善社会财富的配置格局有关。因此,基尼系数在根源上影响着未来的收入分配改革和税收体系调整动向。中国目前的税收来源主体是企业,税源主要集中于生产环节,在生产环节产生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合计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40%以上,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仅为5%-6%,因而现阶段收入差距不足以引发对税收体系调整的需求。当前政治体制决定中国政府是“建设型”政府,现阶段国家对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性支出占比仍然较低;相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明显偏低。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约20%,中国仅及美国的一半,即10%左右。可见,基尼系数改善更多的是需要通过税收体系调整,而非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作者单位:上海证券研究所)